

「關鍵詞與文化互動」專題前言

“Keywords and Cultural Exchanges”: A Foreword

李 爽 學^{*}

一年多以前，英國各大學跨校中國研究中心（British Inter-University China Center）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聯合舉辦了一場會議，主題為「中國文化中的關鍵詞及其翻譯」。收在這個專輯裡的三篇論文，都曾宣讀於這個會議中。會議的構想，是我和其時任教於曼徹斯特大學的沈安德（James St. André）教授共同擬出來的，與會論文的題目自是五花八門。英文論文不宜收在本刊，而這裡所登載者，也僅為會議中三篇同質性較高的論文，輯名訂為「關鍵詞與文化互動」，想表達的是關鍵詞乃文化的核心概念；這一點中外皆然，幾乎普世一致。

倘以中國文化為例，我想古今不同，歷朝歷代都有其核心概念，不同屬性的地域及其文化也有其核心概念。我們若縮小範圍再以文學文類為例，則唐詩宋詞元曲與明清小說無疑是各自所屬時代的大符號、大觀念，而這些符號與觀念的形成，背後都有推動的力量。三國

^{*} 作者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、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兼任教授、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兼任講座教授。

以來梵典中譯盛行，乃唐人絕句與律詩的聲律、元曲的折數與明清小說中「有詩為證」等各種文學形式的推動力。中國與環中國的國家或西方各國的接觸，也曾促使許多概念從明末開始如雨後春筍般產生，我們所知的各行各業幾乎都曾因這些接觸而建構出各自的關鍵詞，中國人的文化生活廣受影響，也因其影響而再形成新的關鍵詞或新的核心概念。關鍵詞或概念的發展故而不會一成不變，而是會因各類文化互動積澱形成，繼而綿延不絕。上面這些話，當初我在本輯徵文的專稿中講過，如今想法依然沒變。

本輯中的第一篇文章，是篇真正的「鴻文」，主稿者乃政治大學鄭文惠教授與湖北經濟學院邱偉雲副教授。兩位都是概念史的研究方家，所為文的大標題是「從『概念』到『概念群』」，而顧名思義，所擬討論者由小而大，觸及了整個概念史中最基本，也因此是最有影響力的問題。若具體言之，他們的論文係從梁啟超（1873-1929）創辦的《新民叢報》出發，探討其中「『國家』與『教育』概念的互動與形塑」，是國際間把這兩概念在史上的發展與結合呈現得最佳的首發之文。

中國人不是沒有「國家」的概念，但是由儒家「君國」觀引發的「朕即國家」的看法卻把人與地理疆域連成一體，終至難分難解而又變成了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」的世界觀。清末列強環伺，中國遭遇史上未曾有之的變局。1896年變法維新失敗後，梁啟超東渡日本，在橫濱刊行《新民叢報》，從1902年迄1907年推出多達96期的專刊，不僅打響了梁氏為人稱道的「新民叢報體」這種個人的筆風，也因他胸懷中國，認為若欲維新之，則當「先維新我民」，故而在德智兼顧的基礎上擬「以教育為主腦，以政論為附從」辦報。梁氏當時還認為「今日世界之所趨，重在國家主義之教育，故於政治亦不得不洋，惟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」也。這篇「辦報宗旨」中，「國家」

與「教育」縮結為一，而梁氏希望可因此而漸次「導中國」於「進步」，¹因使國家與教育又合「進步」而形成三位一體的概念。中國自此走上了一條前此未見的概念新途，擺脫了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的舊有君國觀。

梁啟超「變法維新」的思想泉源之一，咸信是1896年美國南方監理會士林樂知（Young John Allen, 1836-1907）的《文學興國策》。此書英文書名為 *Education in Japan*，編著者是日本外交官森有禮（1847-1889）。他在1872年左右出任日本駐美代理公使，嘗發函美國著名大學的校長與各方名士，徵求他們提供辦學的理想與方針，以便合其所撰之日本史成書。1875年，森有禮又代表日本，擔任駐華公使，斡旋韓國問題，而數年後，就在戊戌變法前二年，林樂知在《萬國公報》上顏永京（1838-1898）的〈日使文學彙集〉一文的基礎上，夥同任旭廷（生卒年不詳）等人，選譯了森有禮所編，終成《文學興國策》。²書中的「文學」一詞為古義，指「教育」而言，是以梁啟超在《新民叢報》發刊辭上的見解，林樂知的名譯上早有預告，可見其人與梁氏對中國積蔽所見之深刻。至於「文學」何以由早年的「教育」等意一轉而為今天的內涵，拙文〈八方風雨會「文學」〉有說明。我們認識及此之前，倒應先了解此義形成之前「文藝」一詞在近代的演變，而這方面中興大學陳碩文助理教授的〈「文藝」如何「復興」？——文藝的一種現代化歷程〉就變成我們必讀的代表性的傑作。

在「文學」的舊義轉為如今的新義之前，「詩賦辭章」、「詞章之學」或「說部」等詞，大概是古人較常用的表示今義「文學」的名詞。但除此之外，「文藝」一詞也不遑多讓，尤有「詩賦辭章」與

¹ 梁啟超：〈本報告白〉，見《新民叢報》第1號，1902年1月，頁1。

² 這段經過參見趙建民：〈森有禮的 *Education in Japan* 在中國的翻譯及其影響〉，《貴州大學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第19卷第2期（2001年3月），頁51-59。

「詞章之學」的內涵；總之，文藝乃相對於經世實學的末流小技。陳碩文助理教授的大作指出，「文藝」最早應出現在《大戴禮記》中，指爲文的方法，而劉勰（c. 465-520）的《文心雕龍》複述之，但是亦具如今的「文學」之意。「文藝」之所以涉及「文學」的意指，另和明末耶穌會士艾儒略（Giulio Aleni, 1582-1649）的用法有關。在《西學凡》中，「文藝之學」出諸歐洲耶穌會大學的《研究綱領》（*Ratio studiorum*），其內容已涉及詩詞與歷史等文藝復興時期前西人的「文學」見解。道光年間，魏源（1794-1857）撰《海圖志》，又用「文藝」指希臘人「九繆思」（Muses）所掌理的「史詩」、「天文」與「地理」等「學問」，而這些學問基本上都存在於詩、歌與神話之中，所以都攸關西方人的文學觀。不過〈「文藝」如何「復興」？——文藝的一種現代化歷程〉表過上述之後，全文才開始進入高潮，亦即晚近用「文藝」表示「文學」與「藝術」，又是如何形成的？

陳文指出，1895年是關鍵年。這一年之前，「文藝」另含官學所具的儒門之學，而這一年中國甲午戰敗，馬關條約踵繼而來，「文藝」和舊義就得說再見，而且幾乎又都和日本有關。陳教授這個假設當然說得通：一部中國留學史顯示，1895年到五四運動前夕，中國人到日本留學者大過於到歐美者，魯迅（1881-1936）、周作人（1885-1967）、郁達夫（1896-1945）、郭沫若（1892-1978）、歐陽予倩（1889-1962）、李大釗（1889-1927）與陳獨秀（1879-1942）乃羣萃大者。³人數既夥，表示由日文中譯的書刊也會多過於前此任何時期，日本「文藝」要取代中國舊有的「文藝」觀並不難。有趣的是，日人的「文藝」時而亦相對於「武藝」，自然是個由中國東傳的名詞，而這顯示必然會和書寫之道相關，尤其是漢詩、漢文，包含一般「美術」在內。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暴發，此際「文學」現代化的步驟早已走完，前述的「進步」的概念遂進一步隱定了「文藝」的

³ 參見馬祖毅：《中國翻譯簡史：五四以前部分》（北京：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，1998年），頁364-399。

內涵。1928年，郭沫若喊出「文藝青年」一詞，指的多是「文學青年」，⁴但在此之外，留歐學者如朱光潛（1897-1986）所撰《文藝心理學》（1936）之中，「文藝」一詞卻指「美學」。所以和日本人所用者一樣，「文藝」可包含「文學」、「藝術」或「美學」在內，左派的文學與藝術工作者尤好使用。1942年5月，毛澤東發表通稱「延安文藝講話」的系列演講，也用「文藝」指文學和一般藝術等二者。在臺灣，用法依然而猶有過之者，電影看板上的「愛情『文藝』大悲劇」所指其實不止浪漫或言情「文學」，連「戲劇」這種「藝術」也是定義之一。

「文藝」是如何「復興」的？問題的答案原沒有個準，陳碩文教授卻梳理得清楚明白。她和鄭文惠教授、邱偉雲副教授一樣，借助現代數位科技之處甚多，所以結論信而有徵。拙作〈八方風雨會「文學」〉就不一樣。數位科技我外行，除了偶爾上網“google”之外，為學之道仍然傳統。拙文幾乎都靠文本閱讀撰成。「文學」有其舊義，上文談得已多。至於新義的形成，我少由東瀛下手，反而認為依舊是由艾儒略1623年撰寫的《西學凡》引發。

《西學凡》所用的名詞是「文藝之學」，包含古賢所傳的格言、詩詞、文章議論與史乘等等。這些內容如今多半都已獨立於「文學」之外，但艾儒略乃義大利文藝復興晚期的人物，出身雖是天主教修會，所本卻仍為文藝復興以前的概念，亦即文章議論與史乘也都可歸入廣義的「文學」項下，而這正是耶穌會《研究綱領》的精神所在。1623年的下半年，艾儒略再度寫下名著《職方外紀》。書中同樣介紹西學，然而「文藝之學」之名，他已改譯。新詞是「文科」，可指「文章議論」所出的「修辭學」（*rhetorica*），當然也包含格言、詩詞與史乘在內。楊廷筠（1562-1627）生前所撰的《代疑續篇》，1635年經

⁴ 見麥克昂（郭沫若）：〈留聲機器的回音——文藝青年應取態度的考察〉，《文化批判》第3號，1928年3月。這裡我引自黃開發：《文學之用：從啟蒙到革命北京》（臺北：秀威資訊，2007年），頁271-272。

人刊刻，而艾儒略在《職方外紀》上所用的「文科」二字，楊氏書中易以「文學」一詞。他如此改譯的原因不明，但已在中國肇下「文學」可指「詩詞」等西方文類觀的開始，值得在史書中記上一筆。楊廷筠曾在武林（杭州）會艾儒略，其後還翼護他入閩佈道。楊氏的改譯，以當時耶穌會書籍流通之暢衡之，想來艾儒略也曾瀏覽，應不反對。楊廷筠的時代，也是公安三袁或李贄（1527-1602）的時代，講究性靈的純文學大盛。

待魏源的《海國圖志》修成，又用「文學」指希臘羅馬古典，而這「古典」中不乏「文章詩賦」等各種著作撰述，我們如今也多以「文學」視之。魏源之前，基督新教早已介入中國的文學論述，蓋1832年創刊的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》中，郭實獵（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, 1803-1851）已為文談〈詩〉，極美荷馬（Homer, 850 BCE?）與米爾頓（John Milton, 1608-1674），而且用「文學」稱呼其所吟。1857年開始，艾約瑟在《六合叢談》中又寫下〈希臘為西國文學之祖〉，所談多為荷馬與賀西德（Hesiod, fl. 750 or 650 BCE）的史詩，連魏吉爾（Publius Vergilius Maro, 70-19 BCE）的《羅馬建國錄》（*The Aeneid*）也不放過，而「文學」當然是他綜括史詩的用詞。艾約瑟在華最大的貢獻之一，是在建構一個中國歷來未罕見的文學知識系統，史詩之外，又擴及修辭學、悲劇與喜劇等文類或知識技藝。希羅多德（Herodotus, c. 484-425 BCE）與修西底地斯（Thucydides, c. 460-c. 395 BCE）的歷史墳典，艾約瑟同樣納入文學的囊袋，因為其中滿布神話傳說與向壁虛構。凡此種種，顯示的是文學系統已定，足以令梁啟超或王國維（1877-1927）借鏡，也足以納入字典之中，而首先如此譯成者，應該是羅存德（Wilhelm Lobscheid, 1822-1893）在1866至1899年間編纂的四卷本《英華字典》。基督教士的文學論述以西人為主，但郭實獵、艾約瑟以降，也未讓中國子部說部與史部缺席，金聖嘆（1608-1661）的「六才子書」、楊慎（1488-1559）的歷史彈詞或元人的雜劇，他們都取以比諸

荷馬等人的史詩或戲劇，使之延伸成爲世界文學的一部份。中國「文學」終於翻案功成，基督教士厥功甚偉。

「關鍵詞與文化互動」這個專輯，始於梁啟超的「國家」與「教育」論述，再經「文藝」的意義之旅增色，終底於成於「文學」概念的翻轉，多少也解答了一些關鍵詞與中國文化互動上的難題，我們寫來自是欣然無比。但我們自知學術乃公器，是以不論鄭文惠、邱偉雲與陳碩文等教授或區區在下，我們都無意居功。學界濤濤，研究上可做得比我們更透徹者不知凡幾，而後浪推前浪又是學術常態，乃進步的動力，我們豈可倨傲露驕？這個專輯只是一個開始，我們歡迎任何批評與指正，如此則經年努力與經營，或許功不唐捐。